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

晁福林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晁福林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ISBN 978-7-300-12223-6

Ⅰ.①夏…
Ⅱ.①晁…
Ⅲ.①社会发展史-中国-夏代②社会发展史-中国-商代③社会发展史-中国-西周时代
Ⅳ.①K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2931 号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
晁福林　著
Xia-Shang-Xizhou de Shehui Bianqi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398（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23.25 插页 2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59 000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原版自序

夏商西周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发展过程中自成一系的重要历史时期。对于我国古代的历史发展，专家一般多注意到了夏商西周时期所发生的巨大变动，例如史学大师王国维在他的著名的《殷周制度论》一文就开宗明义地说道“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观堂集林》卷十)。在我国古史分期的研究中，不少专家从各个角度对于这个变动进行了探讨。我在学习我国古史的过程中，一方面服膺专家们的精辟论断，另一方面又深感除了巨大的变动以外，在夏商西周时期的历史运转中还存在着许多方面的承继和发展的内容，并且从某种角度上看，甚至可以说承继多于变动。这个历史时期，变革当然是存在的，但并非我国古史上最剧烈的时期。这个历史时期，社会上的矛盾斗争是存在的，但并没有后世那样惊天动地的引起改朝换代的阶级斗争出现。睿智的孔老夫子曾经说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夏商西周时期的变革只是“损益”，而不是社会制度、社会性质的剧变。我以为将夏商西周这个历史时期作为一个大的历史阶段进行阐述，比之于将其支离开来讨论，要更合适些。前辈专家筚路蓝缕，对于夏商西周的历史进行过多方面的深入研究，足以启迪我们的思考，然而对于夏商西周进行鸟瞰式的整体性的阐述，从而使人们对于这一重要的历史时期有一个总体上的印象，这个工作还做得不多。这本小书的着眼点就在于对专家较少注意的这个方面的内容进行探讨。需要指出的是，本书虽然试图对于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进行总体性质的研究，但是有许多方面却都在遵循前辈专家所开辟的道路前进，总体性质的研究与深入的探讨两者之间相辅相成，所以本书在许多地方又花费了不少篇幅来进行一些具体的研究，力求使所构筑的大厦多一点牢固的基础，使我们所阐述的内容多一点厚重的历史感，使本书所叙述的夏商西周时期社会的巨

大运转更能接近一些历史的真实。

和春秋战国，乃至秦汉以降的社会发展相比，从所跨越时间和演进速度这两个方面看，夏商西周的社会历史演进过程相当漫长，演进的速度则较为平缓。然而，和我国的原始时代相比，夏商西周的社会历史演进却又是较短的，演进的速度却又很快。在我国自远古以来的历史进程中，夏商西周正是联结两个巨大时代的不大不小的一环。如果说秦汉以降我国杰出而辉煌的古代文化是铜铸铁造的历史丰碑，那么，激烈动荡的春秋战国时代就是铸造这一丰碑的铜液和铁水翻滚沸腾的时刻，而夏商西周便正是为这一历史的浩大工程作出完善的准备，从而使历史的熔炉不断升温的时期。研讨历史的人们既喜爱观看那令人仰止的丰碑，领会那动荡沸腾所带来的美妙，又对于较为舒缓的历史演进产生兴趣。本书的内容没有涉及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历史丰碑，也不着眼于那沸腾的历史场景，而是试图以新的角度来研究和探讨夏商西周时期舒缓的历史变迁和社会的巨大运转。如果可以进行比喻的话，那么就可以说夏商西周时期的历史发展犹如平缓流淌的大河。在静静流动的河边拣起几粒美丽的小石子，捧起一抔细沙，固然得不到欣赏“飞流直下三千尺”那样的激动，但是其中的美妙与欢悦，哪里是破浪冲击时所能领略到的呢？

研究夏商西周时期的社会性质，是本书着重注意的地方。专家关于我国古史分期问题的研究近年取得了很大进展。本书试图从正面进行阐述，提出一些与以往不同的看法，以论证夏商西周的社会性质问题。依照我的看法，夏商两代的社会性质应当是氏族封建社会，而西周则是宗法封建社会，到了东周时期，宗法封建制逐渐解体，而慢慢步入了地主封建社会。关于夏商西周时期的社会性质的研究，既需要理论上的突破，又需要对于大量史料的再探讨。我国古史分期是一个巨大的研究工程，前面的路还很长，我的一些阐述，只是为专家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而已，如果这些阐述能够成为这条道路上的一粒铺路的小石子，那就是我十分欣慰的了。夏商西周时期的社会面貌是本书另外一个着重注意的地方。讲我国古史上的社会变迁，似乎应当尽量说明当时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生活情况及其发展变化。在对于社会历史的阐述中，政治、经济是重要的部分，但不应当占据垄断的地位；政治家、思想家的理论是社会思想的精华，但并不代表社会思想的一般面貌。本书试图对于夏商西周时期的社

会面貌进行一些新的探索和阐述，只是由于学力所限，因此这些工作做得还很不够，还需要花大工夫进行再研究。

除了学力所限的问题以外，夏商西周时期这方面资料的缺乏，也造成了许多困难。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之一是进行对比性质的研究。历史发展具有显而易见的延续性。夏代社会的许多情况是我国原始时代后期情况的延续，而春秋时期的一些情况又是西周时期的延续。显而易见，从“损益”的角度对于原始时代后期和春秋时期的社会情况进行阐述，就是十分必要的工作。尽管这个阐述不能代替对于夏代和西周时代的研究，但作为参考和借鉴则还是需要的。

对于研究者来说，如果想重塑和再现历史的面貌，那么任何人都将回天乏术。谁都无法用文字，乃至我们迄今为止所知道的任何一种表现方式来重现一个时代。在浩如烟海般的资料面前，近代史和现代史的专家尚且有此类的慨叹，对于我们而言，要在资料不太多而且又很繁难的情况下再现夏商西周社会历史风貌，谈何容易。可是，这样的困难却不应当成为我们故步自封的理由。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深感需要再研究的问题的数量之多和任务的艰巨，书中虽然凝聚了自己多年学习和研讨的一些心得体会，但是错误和不妥之处，一定还有不少，敬请专家和读者多多指教。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不少师友给予许多教诲，还得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领导的大力支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鲁瑜同志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悉心审阅书稿并更正原稿中的纰缪疏漏多处，胡云富同志为本书封面题签，在此一并致以衷心谢忱。

晁福林

1995 年 8 月 28 日

序于北京师范大学励耘五楼寓所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 1
第一节　我国上古时代的社会发展 …… 1
第二节　夏商西周的历史地位 …… 10
第三节　研究夏商西周社会的基本资料和基本理论 …… 19
第二章　社会政治历史的演进 …… 35
第一节　传说时代与夏朝概况 …… 35
第二节　商族的兴起和商代方国联盟的发展 …… 48
第三节　周王朝的强盛和衰落 …… 85
第三章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进步 …… 142
第一节　社会经济的发展 …… 142
第二节　社会生活的进步 …… 159
第四章　社会性质的演变 …… 173
第一节　文明时代初期社会发展道路问题 …… 173
第二节　夏代的氏族封建制 …… 179
第三节　殷商时代氏族封建制的发展 …… 193
第四节　周代的宗法封建制 …… 209
第五章　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的变动 …… 238
第一节　夏王朝的国家机构 …… 238
第二节　商代的社会结构和阶级状况 …… 244
第三节　商代社会制度 …… 257
第四节　西周时期的社会结构特征 …… 277
第五节　西周时期的阶级与国家 …… 300
第六章　社会文化的发展 …… 314
第一节　占卜、祭祀与甲骨卜辞 …… 314

第二节　殷代文学和史学的萌芽 …… 323
第三节　彝铭与西周时期的史学 …… 331
附录　作者论著目录 …… 346

再版后记 …… 357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我国上古时代的社会发展

善于追寻历史发展的踪迹、总结历史经验，是祖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之一。在研究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当先提纲挈领地缕析一下我国上古时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以便我们对于作为我国古代文明初期发展阶段的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问题进行探讨。其中最有关系的是这样两个问题：第一，这个文明的初期阶段是在怎样的环境中产生的，第二，这个文明的初期阶段是承继了怎样的社会文化遗产而得以发展起来的。

从距今大约一万年左右的时间开始，我国大部分地区陆续进入新石器时代。陶器制造的开始、农业的出现、居民村落的普及、氏族制度的形成等，是这个时代区别于旧石器时代的主要标志。新石器时代延续了五六千年之久，到距今四千年左右结束。这是远古历史上的“野蛮时代”，是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的过渡阶段。我国至今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有七千多处，正式发掘的有一百多处。自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以来，各个地区产生的不同风貌和水平的文化发展，到了新石器时代逐渐形成了绚丽多姿、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在新石器时代，主要的文化区域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东南地区、西南地区、北方地区等几个大的区域。

新石器时代晚期最有影响的典型的文化是龙山文化。考古资料表明，龙山文化已经遍布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区域。在龙山文化以外，其他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也扩大了分布范围。这是社会生产力和上层建筑比过去迅速发展的结果。广大范围内的龙山文化可以划分为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三个大的部分。山东龙山文化是在大汶口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形成。其陶器制作普遍采

用快轮，造型规整，器壁薄而均匀，技术精良，特别是漆黑光亮、薄如蛋壳的泥质黑陶更独具特色。当时制玉工艺已经专业化，能生产出精美的玉质礼器，山东胶州市三里河遗址出土的成组玉器和日照两城镇遗址出土的刻花玉斧，都是典型器物。山东寿光市边线王村北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现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堡遗址，面积达5.7万平方米，为迄今所见龙山文化城堡之最大者。山东龙山文化的房屋建筑普遍采用挖槽筑墙和原始夯筑的技术，多有长方形土台式建筑，居室地面往往分层筑成。从仰韶文化发展而来的河南龙山文化分布较广，可以划分为五个地区性的类型。一是以洛阳为中心的伊洛流域的“王湾类型”，其陶器多饰以方格纹，并极少有鬲。河南登封王城岗曾发现龙山文化时期的方形城堡。二是分布在豫北、冀南和鲁西的“后冈类型”，其陶器多饰以绳纹，邯郸涧沟遗址发现有丛葬坑。三是豫东和皖西北的“王油坊类型”，方格纹为其陶器的主要纹饰。淮阳平粮台发现面积达5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堡。四是豫晋陕交界处的“三里桥类型”，陶器纹饰以绳纹为主。五是豫西南丹江流域的“下王岗类型”，其陶器以灰陶、黑陶较多。郾城郝家台发现有龙山文化中晚期的方形城堡。以渭水流域为主并遍布陕北、陕南许多地区的陕西龙山文化一般分为早、晚两期。陶器以灰陶为主，也有些红陶，器形和纹饰多有与其以东的河南龙山文化、以西的齐家文化相似之处，反映了这几个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房屋以半地穴式为主，有内室和外室。在外室，正对斜坡出口处常有炊爨或保存火种的壁龛；在内室，有储藏粮食的袋形窖穴。临潼康家遗址发现有成行排列的100多座房屋基址，其布局为考察当时的社会结构情况提供了资料。除了龙山文化之外，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比较著名的还有分布在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分布在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分布于岭南地区的石峡文化。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种有代表性的文化以外，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在内蒙古凉城、吉林和龙、黑龙江尚志、福建闽侯、海南陵水、云南沧源、西藏昌都、新疆哈密、台湾台北等地都有重要发现。

新石器时代的社会经济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特别是因适应不同的自然环境，南方与北方的农业发展在新石器时代即显露出地域差别。北方地区以粟为主，半坡遗址中的一些瓮、罐和室内小窖都发现有粟的遗存，多者一处可达数斗。属于马家窑文化的青海乐都柳湾墓地的多数墓内都随葬有装满粟的陶瓮，少者一个，多者达四

个。南方地区多有稻作农业的遗物。河姆渡遗址普遍发现稻谷、谷壳、稻秆、稻叶等的堆积，最厚处超过 1 米。当时的农业生产工具除了石器以外，还有骨器、木器、陶器等多种，许多工具采用复合形式，如带木柄的石斧和石锛，装柄的骨镰和蚌镰，有柄的鹿角镐等。属于仰韶文化的河南临汝阎村遗址的沙质红陶缸和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山东莒县陵河遗址的灰陶陶缸，分别绘有石斧、石锛图像，还显示了这类器物的捆扎组合方法。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山东胶州市三里河遗址所发现的粮仓，是当时农业生产情况的实物例证。编号为 F201 号的粮仓，略呈椭圆形，长径 3.06 米，短径 2.56 米，门向东，西北部有一个椭圆形窖穴，体积约为 2.80 立方米。窖穴底部用黄褐色土掺红烧土末筑成，厚 10 厘米；穴壁先抹 3 厘米厚的黄褐色土，表面再涂黄褐色泥浆，这样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隔潮的作用。发现这座粮仓的时候，其窖穴底部还遗留 1.20 立方米的灰化或炭化粟粒。窖穴上有椭圆形的半地穴式房屋，室内除了窖穴之外勉强能容一人进去存取粮食。这类粮仓或窖穴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多有发现，甘肃秦安大地湾第一期遗址编号为 F374 号的一个圆形窖穴，底部发现有炭化的油菜籽。属于马家窑文化的甘肃东乡林家遗址的 F19 号窖穴内发现有成把的黍穗。陕西西安半坡遗址的 F115 号窖穴，发现有许多粟的朽灰。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发现 189 座长方形窖穴存留有粮食朽灰，部分朽灰经鉴定为粟。这些粮仓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经达到了相当水平，所以才能有许多的粮食储存。

家畜饲养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经出现，后来逐渐发展，当时的家畜有狗、猪、羊、牛、鸡、马等多种，其中以猪的数量最多。猪不仅供食用，而且用作祭品或显示财富的一种标志。属于龙山文化的邯郸涧沟遗址的一个灰坑中就有作为祭品的 21 个猪头骨，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山东胶州市三里河遗址的一座墓葬随葬有 32 个猪下颌骨。渔猎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龙山文化尾部带孔的双倒刺或三倒刺的鱼镖，牙质鱼钩，以及角镞、网坠等渔猎工具都很精良。许多遗址所发现的飞禽走兽骨骼就是当时猎获物的遗骸。

在新石器时代的社会经济中制陶业的发展相当突出。仰韶文化的彩陶、龙山文化的黑陶，无论器物造型、彩绘纹饰，或是慢轮制作与快轮制作，以及掌握烧制火候等，都有相当水平。依据考古发掘资料，可以鉴别出手制陶、慢轮制陶、快轮制陶的区别，其区别的标准主要是观察陶器表面和底部遗留的制作痕迹。快轮制作的陶

器，造型端正，器壁浑圆，器底有偏旋痕迹。手工或慢轮所制陶器的表面往往有各种拍印纹饰，器体造型不规正，器壁厚薄不匀，常有压、抹的痕迹，器底没有偏旋痕迹，有些在器底留有各种编织纹。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不少各种式样的“帽式”、“锣式”陶质转盘，专家依据当代民族学的资料对于使用这些转盘的方法进行了研究，并且指出，“仰韶文化的陶器大量是慢轮制陶，唯有少数杯、碗、盘、盖等小型器物是经快轮制作的；或是将快轮制好的两个个体粘合成一体（如束腰葫芦形陶器等）的……但是也必须看到仰韶文化中还有大量陶器仍然是手制的”①。大量的考古资料表明，无论是仰韶文化时期，抑或是龙山文化时期，各个地区的制陶技术发展是不平衡的，手制陶、慢轮制陶、快轮制陶往往同时并用，但就总的趋势看，则可以说在制陶技术上仰韶文化以慢轮制陶为主，但快轮技术也在发展。在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后期，已经出现了不少快轮制陶的实例，其后的屈家岭文化快轮制陶技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屈家岭文化晚期的典型器物普遍采用快轮制陶，例如高圈足杯、矮圈足杯、壶形器、盂形器的器身及圈足内壁、双腹碗、双腹豆的圈足内壁，都常见螺旋式拉坯指印”②。龙山文化以快轮制陶为主。这种快轮制陶最具特色的作品是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1960 年在山东潍坊姚官庄遗址发现 5 件蛋壳黑陶杯。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在山东胶州市三里河遗址发现完整的蛋壳黑陶杯 31 件，另有 2 件残器。这些黑陶杯，一般壁厚不到 5 毫米，重不到 50 克，器体轻薄，制作特别精致。这些黑陶杯分别出自 26 座墓葬中。有这种杯的墓葬一般都规模较大，随葬器物较多，说明它们在当时的社会上只为一部分人所享用。从这种黑陶杯上大下小、重心不稳、器壁薄而易碎的情况看，它很可能由于其制作精良、独具特色而被作为礼器，日常生活中并不怎么使用。

烧窑技术的发展表明当时已经具备了炼铜的条件。冶铜业发展最为突出的是齐家文化。甘肃武威市皇娘娘台遗址有铜刀、凿、锥、钻头，永靖县秦魏家遗址有铜锥、斧、指环，青海贵南尕马台遗址和甘肃广河齐家坪遗址都有铜镜。这些铜器既有红铜，又有青铜；既有用冷锻法制造者，又有采用冶铸方法制造者。山东胶州市三里河的龙山文化遗存中发现有 2 件黄铜残钻形器，均为铸造而成，其

① 李仰松：《仰韶文化慢轮制陶技术的研究》，载《考古》，1990（12）。

② 李文杰：《试谈快轮所制陶器的识别》，载《文物》，1988（10）。

中除铜外，还含 20.2%至 26.4%锌，还有少量的铅、锡、铁、硫等，检测表明其内部组织不均匀，说明原料成分复杂，冶炼方法原始。但是，黄铜的出现仍然是很有意义的事情。精细手工业的最突出成就表现在玉器制造和牙雕、骨雕技术的发展上。大汶口文化有剔地透雕的或镶嵌绿松石的骨筒和象牙筒，还有玲珑精致的 17 齿象牙梳和雕花骨匕。良渚文化的大量玉器多雕琢有精美纹饰，采用浅浮雕、半圆雕、镂空、圆雕等技术，琢刻出繁密图像，还出现了主体纹、地纹和装饰纹的三重装饰，具有相当高的工艺水平。

新石器时代中后期，部落和部落联盟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反映在考古学上便是这个时期文化区域的扩大。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都发现了规模宏大的祭祀遗址，都非某一个氏族所能单独完成者，而应当由部落或部落联盟同心协力所筑成。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部落联盟在社会上极有影响的时期，作为社会基础的还是氏族，就是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氏族也还长期存在，有些氏族还发展成为国家。这种情况在夏代特别明显。史载：

> 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史记·夏本纪》)

夏代虽然没有后世那样的分封诸侯的制度，但是氏族以及以氏族为核心的国家的普遍存在则还是可以肯定的。我国上古时代作为朝代而言的夏、商、周三代，实际上都是由氏族发展而形成的，并且这些氏族都有悠久的历史和顽强的生命力。商代的氏族组织也相当普遍。卜辞中屡有“王族”、“多子族”、“三族”、“五族”等记载。商朝灭亡的时候，周曾将商的一些氏族分封给诸侯国，见诸史载就有分封给鲁国的“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分封给晋国的有“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左传》定公四年)。氏族组织的长期普遍存在对于社会观念和社会习俗，具有重大影响。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与氏族组织依旧长期存在的同时，家庭和宗族已经越来越在社会上占据重要地位。古人曾经十分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情况，并且精确地表述了家族占有主导地位时期的社会习俗特征：

>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

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礼记·礼运》)①

这个“小康”时代，从其所列的代表人物情况看，正是夏、商、周三代。这正是“天下为家”——即以“家”为社会基本单位的时期。“小康”时代尽管强调仁爱与谦让，但是在社会上却是私有观念占据主要地位，“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从社会习俗的另一面看，仁爱、谦让观念的提出，正反映了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大量的不仁爱、不谦让的现实，所以才需要从社会观念方面予以提倡，以各种制度加以限制。夏商西周时期的社会结构情况，与原始时代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夏代而言，可以说其社会结构是直接脱胎于原始的部落联盟与氏族组织的。

原始时代的社会文化与社会观念对于夏商西周的社会也有很大影响。

用彩绘、雕塑、刻画等手段创造出生动而古朴的动物和植物形象，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色之一。仰韶文化陶器的内壁多绘有鱼、蛙、壁虎、鹿和鸟类的形象。半坡遗址的一个陶盆绘有四只构图简单的小鹿，充满跳跃奔突的情趣。临潼姜寨所出土陶盆内壁绘有一只正向盆沿踽踽而行的笨拙的大蛙，瘦弱纤细的腿爪与满背圆斑的肥硕大腹相映成趣。河姆渡文化的雕刻精细的象牙制品中有双翼平展滑翔飞行的蝴蝶、引亢鸣啼的双鸟，陶塑作品里有略显肥胖的憨厚小猪，陶器往往饰有稻穗、叶子等图案。当时所创造最多的是在人们印象中属于善良、温顺型的动物，它们或比例匀称、或憨态可掬、或色彩艳丽、或鸣啼悦耳，总是给人以亲切可爱的感觉。这个时代，特别是其早期和中期，极少见到凶残、丑陋的动物形象出现在艺术作品中，偶尔见到者也都按照人们的观念加以艺术处理，如陕西华县柳子镇所发现的一件陶鹰鼎，腹部中空，构成鼎身，双爪和下垂的长尾构成鼎的三足，整件作品给人的印象是它已经失去了攫取弱小动物的勇猛气势，凌空翱翔的猛禽已被剜空腹部而受到惩罚。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饕餮纹之类的狰狞形象，但那是行将来

① 关于这段话里面的“大道既隐”一句含义的诠释，请参阅本书第五章第一节。

临时代的文化在旧时期里的萌芽，从本质上看它并不是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东西，对善良、和谐的美的追求才是新石器时代艺术的主题。这与当时人们的原始民主、平等观念及和谐、乐观的精神面貌是一致的。新石器时代的艺术作品常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仰韶文化陶盆内壁的上部绘有人面、鱼纹、花纹的组合图形，人面的双眼表现出一种安详静穆、若有所思的情态，好像是陶醉于鲜花的芳香，又像是在谛听游鱼的细微动静。画面上的大鱼、小鱼均向人面游动，花纹也以人面为中心而展开，这可能是对人为自然的核心这一观念的表现。河南临汝阎村发现的一件仰韶文化时期的陶缸腹部画有《鹳鸟石斧图》，左边画一只肥润丰满的鹳鸟嘴叨一尾大鱼，右边以棕色勾画出一柄直立的石斧。鹳鸟衔鱼是自然界生生灭灭的一种象征，而木柄石斧则是人类力量的象征，整个画面表现了人与自然平行发展、和谐相处的主题。新石器时代各种社会矛盾还远没有达到激化的程度，暴力和征服之神尚未普遍降临人间，所以当时的人们往往以喜悦、乐观的情绪去观察世界，尽管物质生活匮乏，但精神状态却积极向上。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随着贫富分化与阶级的萌芽的发展，人们的精神面貌逐渐有了较大的变化。

新石器时代后期，在基本平等的情况下，氏族首领凭借其权力往往拥有较多的物质财富，扩大私有财产的范围，成为氏族的权贵。这种贫富分化的现象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已显露端倪。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墓地上，墓葬和葬具的规模，随葬品的多寡与质量已经有了较为明显的差别。不少墓葬墓穴狭小，仅能容尸，随葬品很少，甚至有空无一物者。但埋葬一老年女性的 10 号墓却不仅有很大的墓穴，而且有内壁涂朱的棺和用原木卧叠构成的椁，随葬有用 77 个单件组成的 3 串装饰品、玉臂环、玉指环、玉铲、象牙筒、骨雕筒、象牙梳等精美饰物和用具，还有各种陶器 90 多件。齐家文化是继马家窑文化发展而来的，在马家窑文化时期，其墓葬还没有发现随葬品严重不均的现象，墓葬规模、葬具也大体一致。到了齐家文化时期情况就有了很大变化，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齐家文化遗址共发现 88 座墓葬，一般规模都很小，只有 1 件或 2 件随葬的陶器，有的小墓甚至空无所有，但有一座成人合葬墓，随葬品多达 43 件，其中各式精美陶器有 37 件，有一座三人合葬墓，除随葬 7 件陶器外，还有玉璧 83 件、玉璜 1 件、小石子 304 粒。甘肃永靖大何庄、秦魏家以及皇娘娘台的齐家文化遗址都用羊头、羊下颌骨或猪下颌骨随葬，仅

猪下颌骨就有 590 多块，但是各墓数量不均，多者 68 块，少者仅 1 块。齐家文化时期社会上的贫富不均已经成了普遍现象。

考古发现所见新石器时代后期人们社会地位悬殊的情况说明阶级已经萌芽。龙山文化时期出现了用人牲为房屋奠基的习俗。河南安阳后冈龙山文化遗址的 15 座房基发现奠基人牲 27 具，有的埋在墙基下，有的在房基或房基外侧的散水下，还有的在泥墙中。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址的一座奠基坑就有人牲 7 具。用人殉葬的情况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就已经出现。江苏新沂花厅大汶口文化遗址有一随葬品丰富的男性墓葬，在墓主脚下，横向并列着随葬有穿孔石斧和猪、狗的 2 名殉葬者。齐家文化为数不少的成年男女合葬墓，最常见的葬式是男子仰身直肢，女子侧身屈肢并且面向男子。皇娘娘台遗址有一男二女合葬墓三座，男子仰卧居中，两女性侧身俯贴于男子左右侧，下肢后屈，面向男子。这类合葬墓的随葬品都比较丰富。专家们一般认为这类合葬表现了妻妾殉夫的关系。这类墓葬在山东兖州、江苏邳州和苏州、上海青浦、福建闽侯等地都有发现。历史上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产生的，新石器时代后期男女合葬的情况正是阶级萌芽的反映。

新石器时代后期社会观念变革的主要表现是人们在粗犷而可怖的自然现象面前不再只是迷惘和叹息，而是试图了解它、征服它，对于在这方面做出贡献的人物，大家便十分尊崇。夸父追日、鲧禹治水、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等反映人类征服自然的坚强意志的传说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这个时期的人们所敬慕的是英雄，是比自己更高大、更神圣的东西。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器物上屡见的云雷纹、饕餮纹等纹饰，以繁复的回旋纹路突出了神人或神兽的巨眼，在其上的云雷纹中还有神面和双眼，犹如天神在变幻莫测的云雷中俯视人间，其形象处于若隐若现之间，显得非常神秘。良渚文化常见以神人兽面像为主题的纹饰。神人有倒梯形的脸面，重圈形的眼睛，鼻下是布满上下相对利齿的阔嘴，头上戴有高耸宽大的羽冠。神人腹部有巨眼、獠牙的兽面形象。神人双手直指神兽两眼，似乎只是轻轻一点，就已经将神兽驯服。神人和神兽的形象毫无和善妩媚之态，但却在狰狞与丑陋中表现出一种降龙伏虎般的威力之美。它能使人肃然，使人敬畏。这种对神的尊崇实际上是对人世间权力的讴歌，是对英雄的颂扬。关于战争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在新石器时代前期为了复仇而进行的械斗和杀伐也存在，但毕

竟数量不多，影响不大，可是在后期，以氏族贵族的贪欲和权势欲为契机的战争却日益频繁。由于战争的需要，武器制造也愈益精良。石峡文化的石钺和石镞，齐家文化的铜刀、铜匕和铜斧，都是典型的杀伤武器。甘肃永昌鸳鸯池出土的石质和骨质的护臂，就是防御性的护身武器。新石器时代后期墓葬中，骨架残缺、身首异位、缺臂少腿、首躯不全的现象屡有所见。江苏邳州市大墩子大汶口文化墓地发现一具腿部有箭伤的骨架，箭头尚在腿骨中，深达 2.7 厘米。死者为一中年男子，其左手握骨匕，左肱骨下置石斧，表明其生前是氏族中的武士。山西绛县新石器时代墓葬遗址发现的一名死者，头部中箭，石镞射穿其鼻骨。宝鸡北首岭的仰韶文化墓地，编号为 M17 的墓葬，死者为一成年男子，双膝间随葬成束的骨镞，表明他生前为氏族武士，骨架缺头，在头颅位置放一件带黑色符号的双耳尖底陶器，下衬皮毛和木板，用以代替头颅。在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中发现有随葬品丰盛，但却没有尸骨的墓葬，墓主很可能是战死而未归者。云南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有八座墓葬的死者都曾遭乱箭射中，编号为 M3 的墓葬中的一青年男子的胸腹部存有十多枚石镞，头部的右颧骨和下体的尾椎骨各有一枚石镞射入骨质内。残杀俘虏的现象在这个时期也多有所见。陕西西安客省庄龙山文化遗址发现 6 个灰坑中有凌乱的人骨架，放置极不整齐，有一个灰坑中同放 3 具人骨架和 2 具兽骨架。河北邯郸涧沟龙山文化遗址有一个径约 1.8 米，深约 0.6 米的圆形葬坑，在一层红烧土下有 10 具人骨架，毫无秩序地叠压在一起，有的头骨上有被砍砸的痕迹。另有一个圆形葬坑埋人骨架 5 具，放置凌乱，有的身首异处，有的呈挣扎状。同一遗址的一个烧灶周围有 4 个人头骨，其上有明显的砍伤和剥头皮的痕迹。龙山文化中普遍存在的乱葬坑，与氏族墓地正常埋葬者的情况形成显明对比。新石器时代后期遗址中的贵族墓葬往往随葬有斧钺之类的武器，以示其勇武。当时人们对于英雄的崇拜也是对于战争的一种颂扬。

城市的出现对于社会结构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最初的城市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近年在湖南省澧县车溪乡发现有属于屈家岭文化中期的城址，这座城址大体呈圆形，面积约 7.65 万平方米，由夯土城墙、护城河以及东、南、北三座城门和城西南部的夯土台基等部分组成，城墙现存最高处达 3 米以上。属于河南龙山文化的王城岗城址由东西并列的两座略呈方形的小城组成，面积约 2 万平方

米。呈正方形的平粮台城址，面积约 5 万平方米。后冈城址，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属于山东龙山文化的城子崖城址，略呈方形，面积约 18 万平方米。略呈方形的边线王城址，面积约 4.4 万平方米。这些城市集中在河南龙山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分布区并非偶然，因为这里生产比较发达、地域平坦而便于交易，物质财富和知识文化比较集中，具备了城市形成的条件。作为一种人为的便于人们生活居住的环境，城市实际上是一个地区各种活动的中心。它不仅为国家的出现创造出了条件，而且使人们的眼光从本氏族投向更大的范围。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缕析，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我国上古文明初期发展阶段的夏商西周在出现于历史舞台上的时候，远古先民已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创造了灿烂的远古文化。在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观念方面，原始时代的创造对于文明时代国家的出现都具有直接的意义。恩格斯对于从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迈进，有一个著名的论述。他说："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深壕宽堑成了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① 如果说夏商西周是我国上古时代的辉煌大厦，那么，我国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远古先民，就是这大厦最初的奠基者。

第二节　夏商西周的历史地位

在我国上古时代相当艰苦困难的条件下，人们所创造的文化能够得以保存并且发展壮大，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就世界历史的范围看，夏商西周时期的社会历史一脉相承，其间不仅没有间断，而且三代的文化渐次延续而屡创辉煌。这不能不说是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奇迹。这一点可以作为我们所阐述的夏商西周的历史地位这个问题的第一方面。

站在文明时代门槛上的禹是夏朝的奠基者。从禹子启开始，夏朝正式建立。夏朝共历四五百年的时间，在大约公元前 21 世纪至前 17 世纪之间。《史记·夏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说夏朝"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所谓"无王"，指夏朝初期太康失国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 版，第 4 卷，164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